

博物館與文化 第8期 頁69~107 (2014年12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8 : 69~107 (December, 2014)

監禁的記憶：  
殖民監獄博物館中的展／禁空間<sup>1</sup>

黃舒楣<sup>2</sup>

Memories Incarcerated:  
Exhibition and Imprisonment in  
the Colonial Prison Museums

Shu-Mei Huang

**關鍵詞：**監獄、懲罰、戰爭、文化資產

**Keywords:** Prison, Punishment, War, Heritage

---

<sup>1</sup>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評審賜予寶貴意見才能完成修改，在此致謝。同時感謝研究過程中惠賜指引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 Keven Blackburn 教授，以及臺北刑務所群落文化資產護育聯盟協助提供的資料。然本文若有任何疏漏錯誤，全為本人責任。

<sup>2</sup>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shumei.hua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年8月29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年11月24日)

## 摘要

本文檢視監獄空間的過去與未來，探討東亞暨東南亞殖民治理如何以建設「現代化監獄」展現，而且再現於當代監獄博物館空間。本研究由描繪帝國主義下亞洲監獄的誕生、拆除或保存為文化資產，來檢視這些殊異又相似的文化政治過程展現了國族主義馴化歷史的企圖。以三個案例，包括臺北監獄、旅順日俄監獄，以及新加坡樟宜監獄，聚焦於其如何再現國家、戰爭、監禁與殖民主義。旅順日俄監獄被完整保存為博物館，成為重要愛國教育基地；樟宜戰俘營區業已拆除，但以一重建小教堂及附設博物館，持續強調二次大戰時期國際戰俘的傷痛記憶。在臺北，已然消失的臺北監獄為戰爭記憶所掩蓋，戰後移民聚落重寫監獄周邊殖民地景，直到近年臺灣政府欲複製日本東京經驗推動「臺北六本木」，讓圍繞著殘存監獄高牆的殖民記憶更複雜曖昧。透過這些記憶或刻意不記憶的歷史路徑與其所通達的博物館，作者將梳理監獄的展／禁空間中所蘊藏的歷史與當代意義。

## Abstract

Mobilizing place memories around the colonial prisons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I draw attention to the colonial project of staging modern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risons in its colonies. State responses to colonial modernity, I argue,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colonial prisons are preserved, demolished, or transformed into heritages laden with cultural politics. By investigating the Taihoku Prison in Taipei, the Lushun Russo-Japanese Prison in China, and the Changyi Prison Camp in Singapore, I trace the varying representations of state, war, and colonialism in these postcolonial contexts.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eserved the Lushun Russo-Japanese Prison and turned it into a museum as a site of patriotic education, the Changyi Prison Camp was demolished and replaced with a focus on a newly-built chapel both to highlight the POW's in captivity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emotional scars of the war years. In contrast, the Taihoku Prison in Taipei, covered by memories of the 1949 Civil War and related cross-strait migration, is presented as a redevelopment site like “a golden goose.” The Taiwan government’s plan to replicate the Roppongi Hills model there, by engaging a city image from its former colonizer, which adds complexity to the forgotten prison.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contain memories of the colonial prisons in postcolonial context, I examine politics of remembering heritage across localities to see how “crime” and “punishment” continuously constitute colonial modernit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meanings.

## 導論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淪陷震驚了全世界，也讓位於新加坡東北海岸的樟宜覆上了戰爭監禁的記憶。超過四萬五千位戰俘曾受困於樟宜，日軍在此遣送超過兩萬八千名戰俘到東南亞、東北亞各地，包括泰國、臺灣、日本、中國東北的旅順。往來這些日據領域的旅程艱辛，挑戰人性道德極限。有關戰爭、監禁、佔領的種種苦痛記憶，並非人人能輕易承受，於是，人們更難以憶及現代化監獄曾象徵着文明進步。現代化監獄的建置合理化了殖民者對於被殖民社會的諸多政治干預，尤其是針對國際司法、戰俘的處置。監獄相關的人權論述，甚至賦予第三國以「保護戰俘」之名義干預戰俘處置安排，例如美國在 1895 年中俄戰爭以及 1905 年日俄戰爭時扮演的角色(Corbett, 2008: 111)。在歷史事件之間，所謂「現代化監獄」在殖民城市中一一興起，監獄建築及其周遭軍事設施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最不悅的相遇之處。今日，這些透過監禁而施展殖民統治的記憶是如何被理解？殖民監獄如何保存又為何保存？這篇論文透過比較研究帝國主義下亞洲監獄的誕生、拆除或保存為文化資產來梳理這些課題。

本文處理三個案例，包括臺北監獄、旅順日俄監獄以及樟宜監獄，聚焦於有關國家、戰爭、殖民主義之後殖民再現。中國政府完整保存了旅順日俄監獄並改造為博物館，成為重要愛國教育基地；樟宜戰俘營區業已拆除，不過一重建的小教堂及附設博物館則強調二戰時期日本囚禁國際戰俘的傷痛記憶。在臺北，日人建築的臺北監獄（刑務所）則為 1949 年戰爭記憶所掩蓋，戰後移民聚落覆蓋了監獄周邊殖民地景，近年則為臺灣政府圈選為「活化資產永續財政方案行動計畫」的重點發展，視為「三大金雞」之一（行政院時政講義，2013）。政府想複製東京六本木經驗在此發展「臺北六本木」，這倣效前殖民者的都市行銷策略，讓原殖民主義與地方記憶之交織更為複雜，作者將以「罪行」和「懲罰」兩個構成殖民現代性的核心概念來梳理其文化政治演示。在日本帝國建築的眾多監獄中，選擇此三個案例原因有二：第一，三個案例可顯示監獄保存的不同作法，包含保存、拆除、選擇性再現；

第二，藉由異地案例延展開日本帝國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歷史地理圖像，包括見證帝國之初（大連、旅順）、南進的殖民地（臺灣），乃至於二戰佔領地（新加坡），由此理解監獄所代表之現代性如何隨帝國興衰而變化，且如何被戰後政權挪用。

本文為一長期研究計畫的初期成果。以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間進行的研究為本，本文以後殖民研究理論中探究監禁與現代性的關聯發展，如何具體展現於「監禁」的空間技術。同時，以文獻回顧、檔案研究、實地參訪整合為個案研究，分析「監禁」記憶在個案中的保存展示。未來研究會針對參與展示的不同作用者進行訪談，在此則暫不處理其決策政治過程對文化表現的影響。本文書寫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回顧現代監獄之建構，梳理監獄如何成為現代化國家建構之工具。第二部分包含三個殖民監獄案例研究，比較其轉化監獄空間作為博物館展示的不同過程及目標。第三部分比較個案以檢視「監禁」的力量如何影響後殖民監獄轉型博物館之生產。結論將省思監獄如何能成為理解現代國族主義運作的場域，以及監獄之記憶建構的可能效應。

### 一、罪、懲罰、監禁：現代化監獄之建構於日本及亞洲

「當我剛開始在葛登穀刺(Golden Gulag)工作時，我認為監獄是國家失敗的結果；我當時還沒有體會到，監獄其實就是一個建構國家的計劃。」茹斯·吉耳摩爾(Ruth W. Gilmore)建構現代化監獄和現代國家有著緊密關係，包括確認法治主權、展示現代性、控制打壓異議以及社經危機(Gilmore, 2002)。吉耳摩爾認為監獄即為「一深陷危機的種族主義國族國家的政治計劃」(Gilmore, 2002: 17)。監禁和戰爭的歷史比起現代國家更為悠久，然現代化監獄作為一種監禁的空間模型是十八世紀的發明。凱薩·巴卡利雅(Cesar Baccaria)的論文「罪與懲罰」(On Crime and Punishments)以及約翰·霍爾(John Howard)的「監獄狀態」(The State of Prison)即指出英國監獄當時的慘酷狀態(Botsman, 2005: 118)。

監獄建築改革運動背後是一股提倡所謂「文明的懲罰」之論述，以興建現代化監獄來監禁受刑人，施以「矯正」而非「懲罰」。論者以為此「接近人性的」刑務空間(Foucault, 1979: 231)應取代嚴酷的身體懲罰，更重視「教育改正」，受刑人可在監獄中恢復、療癒。自 1970 年代起，學者開始爭辯監獄是否失效(Duguid, 2000)，批評者日增，包括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79)和諾爾·摩里斯(Norval Morris, 2002)等都視監獄為國家機器，透過隔離監禁來治理個人。監獄之操作，如同厄文·高夫曼建議(Erving Goffman)，是個「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其構成名義上是為了保護社群免於危險和恐懼，不惜犧牲部分人的福利(1962: 5)。由此，這篇文章企圖要理解現代化監獄之建構在殖民社會秩序維護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關注現代監獄如何協助文明社會施行刑務(Rossi, P. qtd. in Foucault, 1979: 232)，以及其在(半)殖民社會中如何成為權力之象徵。

在美國經歷巨大社會改革的 19 世紀，獄政刑務改革最早由宗教團體努力推動，具體成就於 1829 年的費城東部州立監獄(the Philadelphia 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以監獄建築標記了第一個明顯的監禁實踐轉型(Foucault, 1979: 231)，成為「賓州式監獄」原型。這監獄有放射狀配置的監禁室，位在中央管控的管理員能在視線上掌握受刑人動態。透過個人化監禁，監獄空間讓受刑人感到孤絕，以代替肉身的懲罰。這套系統被視為人性的刑務技術，很快地傳播到英國和歐陸<sup>3</sup>，影響了當時最新監獄建築的構造，包括 1842 年完成的倫敦本東維爾監獄(Pentonville in London, Morris & Morris, 1963) (圖 1)。本東維爾監獄設計為可容納五百二十位受刑人，每位受刑人有其獨立囚室。其設計引起了世界各地有志改革刑務者到來參訪。正如賈克林·威爾森(Jacqueline Wilson, 2008: 34-35)指出，本東維爾監獄作為全世界仿製最多的監獄，此例應為世上首例「黑暗旅遊」(Dark Tourism) (Lennon & Foley,

<sup>3</sup> 歐陸國家以比利時為首，1830 年間由 Édouard Antoine Ducpétiaux 為代表引入賓州式監獄，參考 Thorsten Sellin (1926, 264-277).

2000)，畢竟在 19 世紀，觀光監獄是空前現象。這些計劃或多或少落實了潔洛米·邊沁(Jeremy Bentham)<sup>4</sup>的構想。邊沁構想也啟發了傅柯發表有關監禁與懲罰的重要著作。

很快地，19 世紀中，刑務改革運動之風由傳教士和殖民者帶到東亞。殖民者批評日本和中國的刑務殘酷又落後，以之要求治外法權，設置獨立的法庭和看守機構，這些坐落於半殖民狀態租界的機構成為帝國權力之象徵。<sup>5</sup>換句話說，現代化監獄就是個競逐的場域，入侵者的殖民實踐即由此施展。新加坡、香港、中國沿海城市都有許多案例。在殖民城市中建造監獄，宛如大型公共建設，既實用又富象徵意義，監獄建築配置象徵着殖民秩序在被殖民都市中一一佈設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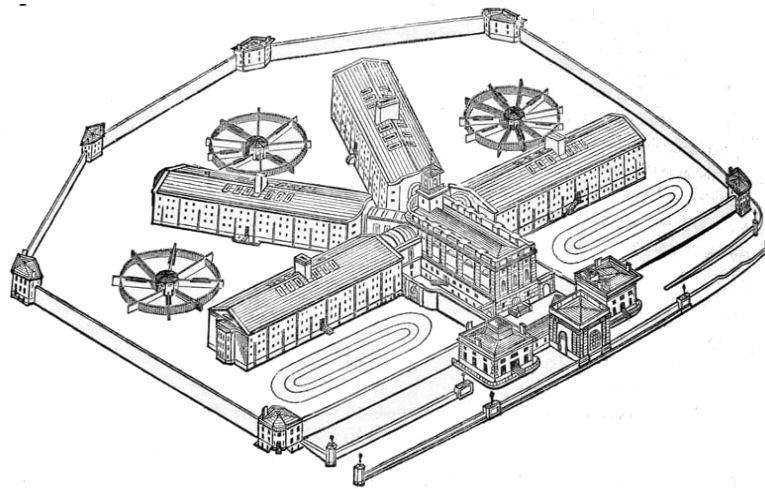


圖 1 東維爾監獄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entonvilleiso19.jpg#mediaviewer/>)

<sup>4</sup> 有關潔洛米·邊沁(1830)的「全景敞視 (panopticon)」可參考《The Rationale of Punishment》。

<sup>5</sup> 有關江戶幕府的刑罰討論可參考 Botsman (2005)。

日本是特別重要的案例，作為曾經抗衡西方的亞洲帝國，卻也在 1854 年簽署了《神奈川條約》後被迫開港，展開對美貿易，自此日本在西方帝國陰影下極力掙扎，努力不成為殖民地，極力爭取修改不平等條約侵犯法治主權的可能。在談判中日本的刑務改革成為敏感議題。畢竟，日本自江戶時期以來（1603-1867）為西方旅人書寫為「異教徒充滿的野蠻國家」(Botsman, 2005: 130)。明治維新因此將刑務改革列為重點，希望能藉由人性化刑務建築改造其國家文明形象。史學家丹尼爾·波茲曼(Daniel Botsman)即主張，懲罰形式的改造是打造現代日本的關鍵重點：

「這不只是一個正式宣告要斷絕以往的懲罰舊習。這個新的刑務制度以及審判程序將成為明治政權改革的決心明證，從各方面努力，一定要讓日本的法務制度和西方強權齊頭並進。」(Botsman, 2005: 170)

《神奈川條約》形成了持久不散的集體焦慮。日本政府盡力要抵抗 19 世紀下半葉中國所經歷的半殖民狀態，尤其迫切希望能修改條約以恢復其法治主權。為了與西方強權對抗，日本極力建立其文明現代化形象(Suzuki, 2011: 138-140)。明治政權派學者到英國殖民地如香港和新加坡，去研究刑務制度之改革<sup>6</sup>，也派員到歐洲學習現代監獄建築(Umemori, 2002)，本東維爾監獄設計為藍本，然後在東京、北海道等地區大興工事。同時日本也在殖民地推動刑務現代化，韓國首爾西大門監獄和臺灣臺北刑務所都是明顯的案例。如海倫·墨菲(Murphy, 2006)指出，刑務改革與現代化監獄的多點計畫，是構築現代化日本的要素之一。

以日本推動刑務現代化過程為例，在戰時美國扮演一特殊角色，時常監督其監獄運作是否如實符合國際標準，因此美國作為刑務「保護者」可要求

---

<sup>6</sup> 1872 年，小原重哉考察回國後出版《監獄則及監獄圖示》(太政官 378 號)。1895 年臺灣監獄令、1896 年監警分離、1899 年兒玉原太郎治理之下頒佈《臺灣監獄則》、1908 年頒佈《新刑法》(同年日本國內頒佈《監獄法》第 28 條，是明治昭和年間監獄機構運作主要依據。進一步參考蔡宛容(2002)。



有關戰俘管理資料甚至探訪戰俘，確認其生存狀態得到保障(Corbett, 2008: 111)。我們必須理解在世界二次大戰時，日本作為快速擴張的帝國與同盟國對抗，這段歷史疊合著其殖民經驗，深化了戰俘監獄內外的歷史複雜性。羅賓·哈維爾(Haver, 2003)的樟宜戰俘營研究十分值得參考，他挑戰了一般視戰俘為無力抵抗者的論述，呈現了受刑人與管理者同為底層人民的互動，不分國籍都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

## 二、罪與監禁

許多戰俘營的前身是殖民監獄建築，然戰俘歷史研究主要關注戰俘監禁的殘酷去人性，鮮少討論殖民主義的影響。但對照兩者是必要的，才可呈現兩種機構空間的內在矛盾。重要戰爭的戰俘來自多個國家，他們被視為愛國烈士、戰爭的受害者，和監獄中因過錯而受刑、需被矯正的犯人截然不同。戰俘營往往擁擠不堪，塞滿了即將調派至各軍事工地的戰俘，而現代化監獄則強調人性的矯正空間，透過分隔、孤絕的管理施行懲罰。然而這般「現代／人性」對照「殘酷／去人性」的二分並不符合現實。不同作用者以各種論述力量持續競爭著殖民監獄空間的形塑，這複雜的系統運作遠遠超過建築形式之創作。

作者建議把戰俘營視為監獄的一種特殊類型，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論述在戰俘營中傾向譴責管理者，而非受監禁者，這點恰好與一般監獄相反，正好提醒我們，罪與監禁的關係並非絕對—為何戰俘之失去人身自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罪證，而受刑人之失去人身自由，反而可以國家公共安全來合理化？兩者建構都以國家為名，罪和監禁的關係卻迥異，仔細想想，為何剝奪一國之國民的人身自由俱有毫無疑問的正當性，而類似行為發生在國家之外時，卻毫無疑義地視為非法暴力？以「罪」來正當化「監禁」（在此指「自由刑」）之論述建構，並非絕對，乃依背景脈絡而變化。

本文試圖以探究閒置監獄、閒置戰俘營之保存以及監禁經驗的再現，來討論罪、監禁、監獄之間的曖昧關係，以及藏匿其中的國家所扮演的角色。

不論是監獄或戰俘營（或兼具兩用途者），「非法性」(illegality)由國家來定義。而保存除役監獄與再現實踐中，國家亦主導了不論是過去或未來的歷史認識論。換句話說，藉由選擇性地遺忘與記憶，國家施展其打造認同的力量。如寶拉·漢彌頓(Paula Hamilton)強調，國家認同之打造往往透過「社會集體的有組織遺忘」(socially organized amnesia)來完成。漢彌頓指出「定義群體或國家總是一個同時施以納入又排除的過程，而記憶則是此過程的重心」<sup>7</sup>；又指出「遺忘可能是塑造國家記憶的最重要力量」。

此處要借用德瑞克·葛瑞果利(Gregory, 2004: 9-10)提出的分析概念，他延續泰瑞·伊格雷頓(Eagleton, 1999)討論可憎的雙生構成，亦即「無法記憶」伴生著「無法行動」，來討論記憶之術之選擇性本質，如何成就因無法記憶殖民歷史因而難以去殖民省思批判的「殖民當下」(the colonial present)，沿用殖民統治相似的治理邏輯、甚至剝削。葛瑞果利以「殖民失憶」(colonial amnesia)與「殖民鄉愁」(colonial nostalgia)來進一步闡釋「無法記憶」伴生著「無法行動」兩相交纏於後殖民經驗中，愈是對殖民過去認知有限，愈是難以批判性的想像未來，避免重蹈覆轍殖民者剝削被殖民者的邏輯，此中文化與權力密不可分，在當前國族主義持續壟斷記憶的當下，殖民失憶交裹著殖民鄉愁，而殖民主義未曾遠去。以此概念來審視監獄以戰俘監禁經驗為主題再現，這選擇性再現過程，隱藏了哪些失憶與鄉愁作用？究竟哪些記憶被選擇性展現？以下三個案例分析將試圖解放受困於監獄空間中的記憶，揭露藏身於戰爭敘事、戰俘傷痕的殖民意義。

---

<sup>7</sup> 寶拉·漢彌頓探討口述歷史在詮釋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可參考‘The Knife Edge: debates about memory and history’(1994)，取自<http://www.multiculturalaustralia.edu.au/library/media/Document/id/513>（瀏覽日期：2014年7月10日）

## 旅順日俄監獄

### 一、戰爭

1895 年中日戰爭以馬關條約作終，日本獲得臺灣與遼東半島。然俄羅斯、法、德「三國干涉」強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給中國，隨即，沙俄強勢控制旅順並建設亞瑟港(Port Arthur, 1895-1904)。十年後，日俄戰爭重寫情勢，日本接收旅順和大連並開始擴張其東北亞勢力。如羅騰·凱爾諾(Kowner, 2001)指出，日本視戰爭為一公關活動，強調其戰爭行為合於國際規範之國家正面形象。島津直子(Naoko Shimazu, 2009)也指出日本政府意圖要打破西方對日本的東方主義認識，粉碎西方理解日本為中世紀野蠻國家形象，藉由戰時能遵守人道標準來善待俄羅斯戰俘，以展現其「人性國族主義」(humanitarian nationalism)——戰爭作為統一團結抵抗外侮的愛國行動，展現國力但同時維持其國族的文明人性形象。西方，以紅十字會為代表，都肯定當時戰俘死亡率之低令人驚異(Emerson, 2008: 18)。然而，當時「人性國族主義」之建構和今天日俄監獄博物館內的展覽再現截然不同。對中國來說，旅順港和大連的歷史象徵着帝國主義入侵，迥異於日本的大連經驗(Takayama, 2012)。這案例將呈現這兩相殊異的國族主義論述如何競爭歷史記憶的話語權。接收日俄監獄象徵着日本回到遼東半島。監獄建築的古典樣式門廊以及兩層樓高的辦公建築乃由沙俄建築於 1898 年(圖 2)。監獄建築群由 725 公尺長、4 公尺高圍牆圍塑起一總面積約 2 萬 6 千平方公尺的園區。兩棟建築包含了 87 間刑房，以放射狀分佈。日本接收旅順後擴建監獄刑房達 275 間，可容納至少 2 千名犯人和 120 名監獄管理員，逐步擴建的還包括醫院、病房(1916)，同年也在大連增建了監獄支部，陸續增建 15 間工廠，分佈於監獄圍牆內外，充分將受刑人轉換為勞動力。還有農場、果園、墓地等等。1934 年時增設一棟全新的刑場建築

### 二、展示「戰爭罪行」的愛國教育

旅順日俄監獄是當代最早的監獄轉型博物館<sup>8</sup>。二戰後，日俄監獄除役。當時並不盛歷史保存主義，也沒有文化旅遊熱潮，然而中國政府決定將之轉化為一愛國教育基地。1971 年日俄監獄博物館重新開放予大眾參觀，完整的建築群被展示為戰爭罪行的證據，見證兩個帝國強權的侵略一沙俄與日本，同年三月由大連市文化部規劃第一個展覽。1983 年時當局建制了一研究中心，收集相關文物和考掘遺跡。旅順日俄監獄有多重文化身份指定，顯示於監獄入口處，可見其重要性。1998 年它被指定為國家級文物，2005 年指定為國家級愛國教育基地、兩年後又指定為遼寧省國防教育中心。早在大眾觀光旅客出現前，多年來已有許多學生成群到此地研習（唐功春，2002）。

值得一提的是旅順受到特殊管制，直到 1996 年為止，外國訪客不得隨意參訪，唯特定經申請的團體旅遊，能在中國導遊的帶領下參觀港區外的旅順北區。事實上，旅順在戰後十年間有蘇聯軍隊駐紮港區（《雅爾達密約》所致），旅順港作為一軍港的定位影響了城市發展的封閉性，直到 2010 年才全區開放。近年地方政府才開始重視觀光發展，今日旅客終能自由參觀軍港。殖民遺產，例如日俄監獄，成為觀光旅遊介紹的重點。



圖 2 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大門（作者攝於 2013 年十月）

<sup>8</sup> 同時期另一案例是愛爾蘭的克禮曼漢監獄修復保存(The Kilmainham Jail)。

今日旅客仍需參加團體導覽才能參觀監獄博物館，一回大約 45 分鐘。每個展室都有主題設定，參觀動線經過的刑房長廊變身為展室走廊，牆上盡是戰俘的見證。整體來說都在強調日本人施以「殘酷極刑」，呼應了中國歷史教材對於近代日本之刻畫。

相對於博物館中展示著日本的罪行，所有受刑人都被刻畫為愛國義士，甚至暗示他們盡是共產黨志士。在博物館出版的歷史相冊中（唐功春，2002），日俄監獄甚至被比擬為納粹施暴的奧許維茲集中營。許多展示都呈現日本監獄管理員施加的高度控制。其中，有一系列餐具展示，以碗盤的七種不同尺寸層級，強調不同國籍的受刑人獲得不均食物配給，而中國籍受刑人獲得最少。其中有一展覽還引用前日籍監獄管理員自白，強調其回憶起中國受刑人獲得的惡劣飲食配給，其中甚至混了砂石。在監獄辦公室外，有一地下儲存槽標示有「醃菜貯藏」字樣，讓訪客想像當時受刑人生活之惡劣。這種種展示強化了中國受刑人獄中生活的艱難。

在「拷打及審問室」中，展示內容提及許多受刑人受到嚴刑拷打致死。據稱，在 1906 至 1936 年間，大約有 1 萬 9 千 6 百名受刑人監禁於此。各式各樣的刑罰包括惡名昭彰的「水刑、鞭刑、吊刑」等等。根據《關東廳要覽》，在該時期（1907-1940）有超過 44 萬 3 千名受刑人接受鞭刑，至少 150 名受刑人折磨致死（程維榮，2012: 144）。

有一展間強調監獄中的惡質醫療，極不人性。展室控訴日本管理者刻意的拒絕治療某些受刑人。由黃鐵城提供的證詞指出「政治犯受到虐待，他們根本沒有被治療」。某位日本籍醫生的證詞最為突出。作為 1944 年 5 月至 1945 年 7 月在職的醫官，他的肖像以巨幅海報呈現在牆上，一旁文字強調其 1999 年 11 月 7 日重返旅順監獄的無限悔恨。照片中他正書寫留下證詞，而一旁解說強調其罪惡感與恥辱感。展覽中還有他發表的回憶文章，被視為日本人罪行的明證（圖 3）。

### 三、跨國主義和國族主義(*Trans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如同前言，建築現代監獄本質上就是個跨國現代性轉譯計畫，充分呈現了「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在殖民城市建設的「次序、理性、肅殺」性格中蘊藏着不斷轉手的殖民歷史過程，然主體總是缺席(夏鑄九，2000)。殖民性和跨國性持續展現於監獄轉換為博物館的時代。近年來中、韓兩國合作催生了一特展，以「韓國抗日義士在中國」為主題，展出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至 8 月 30 日。特展過後，部分展品成為常設展內容，強調韓國受刑人和中國受刑人共享的愛國情緒、相互支持的中韓國族主義。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展示語言即以中、韓、英文三語為主。

展覽中最重要的韓國義士是「就義」於 1910 年 3 月 26 日的安重根。事實上，遊客一踏進博物館後，第一個特展室就是安重根就義前的牢房。安因行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車站被捕。伊藤博文是日本改制君主立憲後第一位首相，1907 年同大韓帝國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迫使大韓帝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此暗殺被韓國和中國視為英雄義舉，然而安重根在日本眼中乃施行暴



圖 3 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內展示的古賀初一悔過記錄

(資料來源：作者攝於 2013 年 10 月)

力的罪犯。這展室保留了安就義前的寢室樣貌，訪客可看見他的書桌椅及臥床，牆上掛有安的書法作品，表達其深深期盼韓國主權復興。值得一提的是，安重根的書法有特殊意義，因其遺體消失成謎，許多追思紀念他的活動都以其書法作品作為投射借代。在首爾有一「愛國志士安重根紀念館」，剛剛完成於 2010 年，由安重根紀念計畫委員會監督，乃其就義百年紀念式中的重點。

少為人知的是，安其實曾贈與多幅書法作品給當時的日籍監獄管理員，這些隱藏的交流以及書法作品上的含義，顯示了上述愛國主義框架下沒能呈現的跨國人性互動。據說至少有 50 幅作品，都留有安重根署名(Wakabayashi, 2008: 160)。目前的展覽並沒有提及。相反地，日本政府多年來持續地對於任何有關榮耀安重根的紀念活動提出抗議。2013 年 11 月 19 日，日本政府宣佈堅決反對韓政府要在哈爾濱車站前樹立雕像的計劃，雖然中國政府是支持的(Torres, 2013)。同時，韓方也對日方表達不滿其發言人菅義偉視安重根為罪人(Hofileña, 2013)。日本時論者警告該計劃會影響日韓友誼。相對的，有些國際政治觀察員認為這顯示中韓交好(Rauhala, 2013)。事實上，為了前述百年紀念活動，安重根雕像已矗立於監獄博物館內。

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展覽內容表揚的義士以中國人為主，不過，也包括韓國義士申采浩為了反抗活動來到中國，被捕後在獄中過世。展覽中強調一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頒發給申義士的「抗日義士證書」。同時，展覽部分內容也強調共產黨志士不屈不撓地在獄中持續組織活動。在庭院草地上豎立着一個石頭，標示着當時共黨受刑人的密會地點(圖 4)。整體而言，這些展覽傾向化約愛國義士之呈現，簡化了監獄這個殖民主義與國族主義碰撞相會的場域。

事實上，整個中國沿海區域有許多帝國主義者所構築的殖民監獄，包括英國在香港及上海、法國在天津、德國在青島所建築的監獄。例如，德國在青島分別為歐洲、中國受刑人建築了兩所監獄，施行種族隔離拘禁，其中的「歐洲監獄」已於 2007 年轉型為博物館。二十世紀初英人在上海建造的提

籃橋監獄將有部分保留作為歷史建築，響應逐漸興起關注人類負面經驗的「暗黑觀光」。

在戰爭、戰俘營中，當年的日本企圖向西方世界呈現「人性國族主義」，然而，今日由中國主導以及韓國協助的博物館再現把日本描繪為戰爭罪行施暴者，完全掩蓋了日本的歷史意圖。日俄戰爭留下的殖民監獄仍是二十世紀大連、滿洲國、東北亞地理想像的重要參考點，且這場有關歷史敘事的競爭還在持續進行。

## 臺北監獄／刑務所

### 一、戰爭後，重新定義城市的戰爭

2013年10月，臺灣中央政府財政部重申要將臺北市華光社區再發展為「臺北六本木」（此概念最早見於內政部營建署向主管都市計劃的臺北市政



圖4 旅順日俄監獄庭院標示「義士活動」景觀石

（資料來源：作者攝於2013年10月）



府提出)<sup>9</sup>，形同推翻 2007 年行政院經建會喊出「臺北華爾街」的概念（秦富珍，2010），「同時將華光社區南緣臨金華街與監獄南牆的日式官舍歷史建築打造為「文化創意基地」。一改再改的政策顯示中央政府經建會、內政部及地方主管機關爭相借用外國案例卻缺乏共識，且從未提到「華光」這隱含着「中華之光」的地名掩蓋了聚落長達百年的複雜歷史。少有人知悉百年前，由華光社區與一旁中正紀念堂所在的區域，完全是臺北城以外，僅有農田、水塘等地景（圖 5）。130 年前當清朝建造臺北城時，也萬萬沒想到十年後臺灣即淪為日人之手。自 1895 年起，殖民者很快地展開了第一項大型公共建築計劃，決定要在臺北東門城外打造一個全新監獄設施一甚至優先於總督府計劃<sup>10</sup>。監獄於 1898 年動工，1905 年完成。在當時臺北打造現代化監獄兼具實用及象徵意義，是對殖民地頑民施行「矯正、同化或教育」的建設計劃（黃蘭翔，1995）。同時在 1900-1905 年間，殖民政府以「市區改正」之名拆除了臺北城，調整市區街道，施以棋盤格計劃（1995）。此間有一重要環節是日人利用拆除下將近九百公尺長的城牆石頭，築起了超過四公尺高的圍牆環繞臺北監獄四周。材料再利用一方面可降低成本，一方面透過象徵前政權城牆石的拆解，構築起象徵新政權現代化過程的監獄，昭示了其對於城市的全盤掌控<sup>11</sup>。如同波茲曼(Botsman, 2005: 209)指出，日本議員竹越與三郎(Yosaburo Takekoshi)1904 年訪臺宣稱：「日本可用它在福爾摩沙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證明自己足以晉身世界強權之林。」身兼國會議員和記者的他參觀剛剛落成的臺北監獄，回到東京後他對刑務學會演講報告，洋洋得意指出清臺北城牆已毀，「那曾用來抵禦外敵的牆，已經變成了一座監獄，用來監禁懲罰殖民地社會不守法紀之人」。換句話說，時號稱「東洋第一的監獄」（黃士娟，2012：25）的臺北監獄建築本身無異為殖民者威權象徵。

<sup>9</sup> 可參考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委託長豐工程顧問公司《華光社區附近地區都市計畫檢討暨都市設計準則案總結報告書》（2006 年 12 月），原來臺北市政府有意主導華光都市更新，故有此計畫，然中央政府意欲強勢主導，因而本都市計劃檢討報告勾勒的願景構想未獲採用。

<sup>10</sup> 起初日本殖民政府暫用清留下官署而後漸漸規劃建設，包括總督府都是 1912 年才開始建造。

<sup>11</sup> 參考臺灣刑務月刊特刊（林暉均翻譯）《臺北刑務所特輯》（原文日文出版於 1938 年）。

1922年，日本敕令277號把司法監獄局改為行刑局，各地監獄行政官廳改為刑務所，用語轉換乃刻意去除「監獄」一詞帶有非文化性、殺伐意涵，故變更為中性意涵的「刑務所」，同時，也隨更名推動刑務制度更朝向「教育刑」發展，臺灣也跟進<sup>12</sup>，臺北監獄改稱臺北「刑務所」。在這致力強調現代文明、教育刑的刑務改革架構下，臺北刑務所群落發展為一自己自足的群落。除了監獄建築本體，圍牆西、北、南側建設有數以百計的官舍、宿舍群落供管理官員居住。群落中還有建築雄偉的「演武場」，供刑務所人員鍛鍊武道之用，乃日治監獄有別於西方現代化監獄原型之特色<sup>13</sup>。刑務所群落還包括水井、浴室、農場、墓地等設施<sup>14</sup>。監獄高牆內有一間間囚室依放射狀平面配置，強調隔離監禁，沿用了賓州式監獄強調「孤絕中自省」的空間形式(Teeters & Shearer, 1957)。監獄內還有受刑人勞動的工廠、醫院等。設施依性別分開區劃。諸多設施宣稱能確保受刑人身心健全地在勞動中反省、



圖5 臺北刑務所平面配置（航照圖底圖來自中研院遙測資料）

<sup>12</sup> 可參考蔡宛容所引用之重松一義「日本刑罰史年表」(2002: 208-214)。

<sup>13</sup> 有關演武場建築形制與日本推展武德教育作為殖民治理之歷史可參考陳信安(1997)與馮啓斌(2012)。

<sup>14</sup> 同注解10。

改正。據說當時臺北刑務所規模讓日本國內都驚呼雄偉，竹越議員甚至大讚臺北刑務所為臺北最美麗的公共建築。這讚美的另一面則不是那麼光榮的，事實上日本於 1899 年才恢復司法自主，而日俄戰爭「晉身世界強權之林」七年後才恢復關稅自主權(Botsman, 2005: 209)。

葛瑞果利指出殖民過程中「建構他者作為建構自身之必要步驟(Gregory, 2004: 5)。確實，臺北刑務所堪為日本佈設全臺刑務機構作為一現代文明計劃的第一步，陸續規劃了 13 所刑務所及支所遍佈全島，以之強化臺灣作為殖民地的次等性，而次等他者的特質，正是日本企圖要躲避西方貼在它身上的標記。這過程反映了殖民現代性，深深銘刻在現代監獄建築所構成的都市景觀。

二戰結束後，「刑務所」命名成為歷史，戰後接收了日人財產的國民政府作為新政權，沿用此處為臺北監獄。在接下來二十年快速的都市化過程中，臺北監獄成為市中心的特殊地景。在都市歷史保存概念還未萌芽的六〇年代，臺北市政府和法務部都同意監獄應搬遷到臺北市外，圍牆外部分顧及宿舍群落搬遷涉及更多經費的安置問題（蔡敏真，2012），則保持原樣<sup>15</sup>。



圖 6 (右) 臺北刑務所南圍牆，由清城牆石砌成  
圖 7 (上) 臺北刑務所官舍 (鄭鈞鴻攝於 2013 年 3 月)

<sup>15</sup> 日本殖民政府在 1930 年通過了《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然而很快地因戰爭而擱置。戰後，相關事務亦沒有啟動，直到 1981 年才有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推動相關事務。

監獄拆除後，牆內土地切為兩份，分別賣給當時的國營事業中華電信與中華郵政。於是兩大辦公園區兀立於圍牆外低矮的日式官舍、宿舍群落，形成突兀景觀。有趣的是，南北圍牆保留至今，而東、西圍牆則因愛國東路開通而拆除（圖 6）。

戰後的監獄群落人口不減反增，尤其 1949 年後，大批隨國民政府遷臺的法務部職務相關移民遷入，也有非職務相關移民陸續進住。房舍供不應求，未分配到宿舍者在長官默許之下，在既有屋舍之間構築非正式房屋。在「反攻在即」氣氛之下，許多人視非正式住宅僅為暫時性棲身安排，沒想到非正式棲居成為數十載都市居住狀態（蔡敏真，2012）。

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臺北市急速擴張，大量城鄉移民北上工作，然政府長期忽視都市住宅政策，急需住處也只得自尋出處。此背景下，監獄圍牆外的房舍，也就是七〇年代初起被稱為「華光社區」的老舊房舍，因其過去是監獄、刑場之背景陰影反而使之相對價廉，不少基層市民落腳於此，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大量出現的違建社區對於都市發展實俱有社會與經濟意義（史宓，2000；桑德斯，2011）。時至 2007 年，華光社區居民一度超過 3 千人。聚落巷弄間有不少國旗懸掛，襯著黑色屋瓦，映射歷史餘暉。許多由殖民者手植的南洋植物旁增添了戰後住民種下的植栽，例如外省移民喜愛以之提味的香椿。景觀層疊反映了華光地方複雜的歷史記憶，流離不斷（圖 7）。

## 二、壓迫與懲罰

自九〇年代起政府一再宣稱要更新華光社區未果，直到 2007 年中央大張旗幟公佈了「四大金磚」，亦即四大國有土地推動公辦都更，包括華光社區，號稱要打造「臺北華爾街」、建設金融商業中心（楊文琪、何蕙安、林淑媛，2007）。五年後，又喊出新口號「臺北六本木」取代華爾街，宣稱要打造國際級觀光旅館、商場（呂雪慧、林淑惠，2012）。從「華爾街」到「臺北六本木」，計劃一改再改卻未曾有公開討論，實質規劃內容亦復闕如。始終如一的是對華光原居民沒有具體安置計劃，唯合法眷戶可獲搬遷補助金

(150 萬至 200 萬不等)。然而，兩百多戶認定為非合法眷戶或違建戶者卻需面對「非法佔用、不當得利」訴訟，以及限期「拆屋還地」、繳交罰款<sup>16</sup>。「非法性」之建構有效地替換了地方記憶，包括殖民經驗以及戰後流離中的匆忙安頓、城流鄉動。

不同於旅順案例，中華民國政府在此無意召喚歷史，不論是殖民時期的刑務改革事業、殖民治理壓迫或是二次大戰戰俘歷史。不可否認，這個國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並不穩定，經歷了反共冷戰年代、八〇年代中的民主化運動，乃至於 2000 年開始首次政黨輪替，數十載下來的國家認同與相關歷史論述爭辯仍未止息。而監獄已然拆除，僅存監獄南、北圍牆和圍牆外的官舍、宿舍群落。1998 年，在臺灣世界戰俘協會的聲請下，終於有一小小展示牌懸掛於監獄北牆，列出 14 位美、加籍戰俘姓名，他們於二次大戰喪命於日本人治理的臺北刑務所，在大戰結束的 58 日之前。當時他們因被視為戰犯而非戰俘，1945 年 5 月 29 日，在此受刑而死於臺北刑務所。60 年後，在 2005 年 6 月 19 日，北牆旁舉辦了一小型追思儀式。其中一位戰俘的弟弟帶著兩位兒子，千里迢迢自美來臺。然而，少有人知道此地景與戰爭、戰俘的關聯<sup>17</sup>，臺灣世界戰俘協會應是唯一團體自發研究這段倍受遺忘的歷史，也因其推動多年乃成立有金瓜石戰俘紀念碑與廣場於 2009 年（此批戰俘由新加坡樟宜戰俘營送至臺灣）<sup>18</sup>。至於曾經滯留海外的臺籍戰俘、戰犯在戰後持續受到剝奪的經驗，臺灣更少有報導記述<sup>19</sup>。

在臺灣，九〇年代前殖民時期留下文化資產受指定者極為少數，帶有負面印象的監獄更不在代表國家文化的想像之內，直到 2004 年的嘉義監獄保

<sup>16</sup> 「不當得利」是民事實體法債法上的重要概念，意指無法律上的正當原因而受有法律上權利或利益，通常是民事實體法的請求權基礎之一，如能證實此利益的獲取與他人利益的損失有所關聯。

<sup>17</sup> 參見「永不遺忘(Never Forgotten)-臺灣世界戰俘協會官網」：

[http://www.powtaiwan.org/The%20Camps/camps\\_detail.php?Taihoku-Prison-17&name=Taihoku](http://www.powtaiwan.org/The%20Camps/camps_detail.php?Taihoku-Prison-17&name=Taihoku)

<sup>18</sup> 少數案例可參考紀錄片《一個戰爭故事》(A War Story)由安惠勒(Anne Wheeler)執導，描繪加拿大戰俘受困臺灣的經驗，該片由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委托製作，然該片在加拿大之外並無影響力。

<sup>19</sup> 陳志和導演拍攝的《赤陽》紀錄片為難得作品關注臺籍戰俘心路歷程。另可參考李展平，2005。《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存運動，才使嘉義舊監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日本殖民時期監獄再利用為博物館的案例。<sup>20</sup>在臺北，有關監獄文化資產保存的討論再起於 2008 年，時內政部推動華光社區都市計劃變更程序所需必須檢討文資，然意不在保存，當時結論竟是除了監獄北牆，「此區文化資產不具保存價值...」，只需針對部分建築物進行測繪紀錄後即可拆除。直到 2013 年 3 月，此區才有較細緻的文化資產討論再次啓動。民間團體發起「臺北刑務所群落守護聯盟」，爭取文化資產指定與老樹保護(Ho Yi, 2013)。經過至少 6 個月的努力換來有限成果，有 22 棟日式官舍以及一公共浴場登錄為歷史建築。換句話說，中央政府國有財產署必須修正計劃，縮小標售地上權之範圍。

### 三、跨國重寫殖民地理：殖民失憶與殖民鄉愁

以後殖民視角來看待「歷史保存」，本質上是不斷地重寫殖民地理的過程。然而，有關建設與拆除殖民者留下的臺北監獄故事，涉及了多重的殖民政權轉變、壓迫、迫遷，從 19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不無諷刺意味的，這些殘存的日式官舍將與抄自日本的「臺北六本木計劃」並存，而此借於前殖民政權的空間想像驅逐了流離在戰爭、國家之間的人民，以打造臺北為全球城市為名。目前未可知六本木計劃是否落實，也不確定監獄南牆旁的歷史建築是否會成為文創基地(廖珮好, 2014)，這些提案像是政權交替之際的「國家」般混亂不明。

以後殖民視角來看待「臺北」，城市中似乎還有一座不可見的監獄，延續着那殖民者以「現代性」為名來「改正」城市的邏輯。這邏輯持續，只是換了「全球城市」的旗幟，以之合理化打造六本木城中城的計劃，此計劃卻建立在以訴訟提告迫遷居民的前提，這隱藏在旗幟下的文明懲罰，把原來希望能集體爭取安置的社區拆解為百餘件法律訴訟，使之難以集結行動，這般

---

<sup>20</sup> 在臺灣金門、綠島有兩處監獄改建博物館，然這兩處都是 1950 年代後所建造，以收容政治犯為主，在 2000 年以後都改為人權博物館區，不同於本文探討的殖民監獄。相較殖民時期對外籍戰俘的處置，臺灣社會更積極保留國民黨專政時期的監獄相關的 228 事件及白色恐怖歷史，以及轉型正義等議題。

懲罰效果，和過去監獄中所施行的隔離技術，並無二致，如此懲罰性都市地景延續着那看不見的監獄運作。現代監獄所體現的「殖民現代性」似乎再次體現於以提告進行的迫遷過程，透過法律程序來指認「非法佔用」，區隔出「違建戶」歷史的非法性，與「我們」的不同。同時，違建戶的流動歷史、居住需求的歷史性匱乏、臺北刑務所地景的邊緣性、複雜性，在法律訴訟主導的敘事框架中都成了「不相關」的一切。而法律所宣稱要保障的「我們」所構成的國家，失去了從記憶中反省的能力。這過程似乎體現了葛利果瑞檢視去殖問題的表徵，所謂「殖民雙生」過程所共生的「殖民當下」一還未能反省殖民地地景記憶就被清除，而國家主導的城市發展藍圖持續壟斷了地方想像。

只有少數曾參與殖民監獄管理的人們還記得監獄內外生活。年屆九十的Y老先生是其中一位，去年三月他刻意從宜蘭來到華光，趕在舊建築拆除前再探年輕時曾居住的單身宿舍。日治時期尾聲曾擔任監獄管理員近四年的他十分難忘該工作經驗，也關心監獄建築保存。近年他曾到旅順日俄監獄旅遊，對於該館能轉型博物館十分欣羨，很遺憾在臺北未能有類似作為（訪談Y，羅東，2013年5月26日）。然而，如果國家與人們都失去了記憶監獄地景的能力和意願，Y的期待恐怕不易實現。目前僅知臺北市文化局有意利用金華街其中一棟官舍作為獄政博物館，然而歷史記憶如何展示仍未有藍圖，恐怕國家仍不會鬆手。

## 一個樟宜監獄，兩個樟宜博物館

### 一、日本帝國前線的二次大戰戰俘

今日大部分的人聽到樟宜，首先會想到樟宜國際機場，以及其所象徵的新加坡作為「世界城市」榮景(Chua, 2011)。然而，歷史上的樟宜曾是一個與二戰日軍虐待戰俘緊緊相連的地名。在樟宜的戰俘死亡率一度達到 27%，達同時期德軍戰俘營七倍以上(Corbett, 2008: 115-116)。對同盟軍來說，有關

樟宜的記憶還包含那震驚世界的「新加坡陷落」以及「死亡鐵路」。詹姆士·克拉維爾 (James Clavel) 的小說《鼠王》(1962) 以及電影《桂河大橋》(1957) 等作品也一再加深樟宜監獄的「恐怖密室」形象。戰俘營早成過去，今日在樟宜機場附近設有樟宜博物館，附近仍有使用中的樟宜監獄，這地景構成複雜而令人困惑，隱藏着戰爭記憶。此案例中，我將分析樟宜的地方記憶，一一梳理有關樟宜戰俘營、樟宜監獄，以及八〇年代逐漸成型的兩個樟宜博物館，說明這兩個樟宜博物館援引國族主義的不同態度。

樟宜位於新加坡島東北隅，1936年原有英國殖民政府建設的樟宜監獄。1942年新加坡陷落後，日本利用該監獄旁英軍營(Selarang Barracks)作為戰俘營，容納大約4萬5千名同盟國軍人，主要來自英國、澳洲，被監禁於該地，如果以運輸中經過樟宜者計算，則有8萬7千名戰俘。當時樟宜戰俘營也作為中轉站，運送那些在爪哇或蘇門答臘被捕的軍人(Havers, 2003: 10-11)。因其地緣關係許多人會混淆戰俘營與樟宜監獄，尤其，後期戰俘營不敷使用，樟宜監獄也確實成為戰俘營。一度，「樟宜」兩字是「戰俘營」的同義詞，尤其對英國與澳洲來說。<sup>21</sup>

戰俘運送至樟宜或離開樟宜的旅程艱辛，更加強化樟宜象徵的殘酷戰爭記憶。自1942年2月至1943年12月，至少有13次主要航程從樟宜運送戰俘到當時日本帝國統治的東亞共榮圈不同區域，包括臺灣、滿洲。許多病弱戰俘喪命於所謂的「地獄船艦」(hell ships)中，在船隻到達臺灣、旅順或波里諾(Borneo)之前。身體狀況相對良好者則多被運送往泰國或日本進行嚴酷的工事勞動，共有169個工事地點，包括鐵路工程、工廠、煤礦或銅礦區等等(Corbett, 2008: 114-115)。這不僅是充分利用戰俘的勞動力，戰俘輸送本身即可向各殖民地展示了日本帝國實力，當時的將軍上村美湖(Miko Uemura)曾如此發言(Corbett, 2008: 113-114)。

哈維爾的研究對於樟宜戰俘營與監獄歷史作了詳盡探討，包括戰俘營的

---

<sup>21</sup> Havers (2003), Appendix I, 178.



擴建、減少規模，以及樟宜戰俘營內的戰俘生活之自主性高，相對於其他二戰戰俘營來說。在戰俘營搬移至樟宜監獄內之前（1944年5月至1945年9月，圖8），樟宜戰俘營內有英軍人積極參與的自主組織活動。戰俘甚至組織音樂會、圖書館、還有戰俘們稱之為「樟宜大學」的課程進行。曾經，戰俘營內還有各式桌牌遊戲、咖啡吧的經營。哈維爾指出(2003: 99)「雖然生活極盡貧困，樟宜的戰俘們仍保持創造驚喜的能力」，這當然也和當時日軍為了前線戰事進行人力左支右絀，無暇顧及戰俘營管理有關。這自主性至少維持到戰俘營改設樟宜監獄。當時考量樟宜戰俘營空間不足，決定互換戰俘與受刑人，於是日軍先騰空了監獄，然後日軍驅策戰俘在最短時間內，利用監獄內空地築起了大約四十九棟小屋供戰俘居住。雖然搬遷後日軍控制提高，然而戰俘們還是想盡辦法創造自己的空間，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宗教性信仰空間。在樟宜曾有至少十二間不同教堂，多在戰後拆除。例如羅馬天主教小教堂(Roman Catholic Chapel dedicated to “Our Lady of Christians”)即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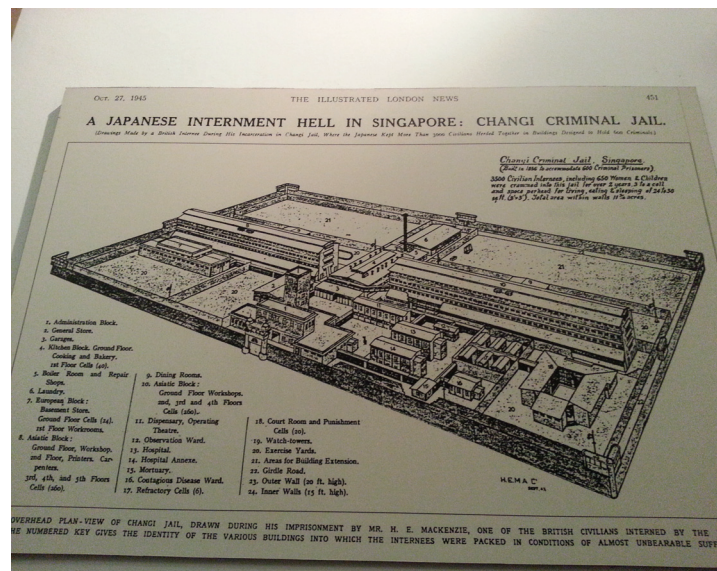


圖8 樟宜博物館中展示「如地獄般的」樟宜監獄透視圖  
 (資料來源：作者攝於2014年1月)

出自戰俘之手，他們利用簡單的柱樑結構，克難地利用椰子樹葉作屋頂。這些小教堂也是他們追思同袍之地<sup>22</sup>。今日在樟宜博物館中可見這些教堂的舊日影像（圖 9）。

## 二、復建「樟宜」，兩個展示計畫

在 1980 年代後期，幾乎同時在新加坡樟宜與澳洲坎培拉啟動了復建小教堂的計畫，恰可凸顯文化資產的地域化與再地域化，以及新加坡、澳洲兩國建構國族主義的不同策略。在澳洲啟動的毋寧是延遲兌現的承諾，原來在 1947 年，戰後拆除之際，澳洲戰俘已經決定要將羅馬天主教小教堂的建築組件小心地裝箱運回澳洲，在坎培拉的敦樁(Duntroon)重建，作為戰俘紀念空間<sup>23</sup>，銘記戰俘經歷的困難。當時還留下了詳盡的影像、建築圖說，以便順利重建。然而，拆下的小教堂零件竟然裝箱收藏達 40 年之久，直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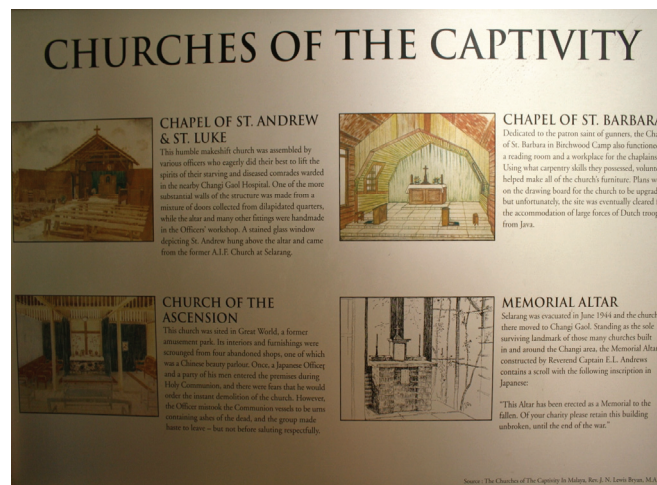


圖 9 樟宜博物館中展示的戰俘營時期教堂  
(資料來源：作者攝於 2014 年 1 月)

<sup>22</sup> 樟宜禮拜堂報告(RMC Duntroon Heritage Management Plan,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 (June 2013).

<sup>23</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澳洲軍方向英國政府請求希望能夠異地保存天主教堂於澳洲坎培拉，可參考 Blackburn (2000)。

1980 年代才重新有人注意，為之奔走。終於，國家戰俘（樟宜小教堂）委員會組成以推動復建計劃，澳洲戰爭紀念聯盟、退伍軍人聯盟、戰俘協會等等都有代表參與。1988 年，軍方為此發起全國性的募款。<sup>24</sup> 今日的樟宜小教堂是個全國性的紀念碑，代表了超過 3 萬 5 千名澳洲戰俘，包括參與波爾戰爭、一次、二次世界大戰、韓戰等眾人。<sup>25</sup> 小教堂的歷史意義已超越了二戰經驗，也不再僅限於東南亞戰事地理。

在新加坡的重建則是截然不同的決策過程。戰後，事實上英國軍隊仍然圍繞著原戰俘營與監獄直到 1971 年，整個樟宜區域都由新加坡軍隊管制使用。雖然新加坡在 1965 年獨立為一自主國家，有些前殖民軍官，甚至包括那些曾在戰爭期間淪為戰俘者，仍留在樟宜服務(Blackburn, 2000)。同時，樟宜監獄漸漸成為前戰俘追思的場所，雖然樟宜監獄持續是個運作中的監獄。不少前受刑人或戰俘由各地來訪，一開始由非正式私人關係進入監獄，尤其受歡迎者是監獄內部一棟基督教小教堂，許多訪客來到後在此留下軍隊徽章，作為追思的儀式性動作。有趣的是，訪客最愛拜訪的這間小教堂並非前言所提的戰時教堂建築，而是戰後由受刑人所建造，似乎是自然地產生移情作用。到了 1980 年代初期，接待訪客逐漸正式化為旅遊事業。根據 1986 年時的統計，每天約有 200 名訪客拜訪樟宜監獄，商業化傾向愈發明顯，也開始有管理疑慮，擔心旅遊活動將危及監獄維安。因此，在 1986 年底，監獄方面決定將小教堂「異地重建」於監獄外。許多訪客對此十分失望，因為新的安排讓他們不再能體驗進入樟宜監獄的新奇感受。布雷克伯恩（2000）的研究檢視了當時的數個提案如何爭辯重現樟宜歷史。有幾位顧問曾堅持「穿越監獄大門」是體驗中最獨特的重要環節，有些人則主張建設一博物館，邀請國際旅客、前戰俘參與博物館規劃，才是最佳紀念方式，甚至有人主張應結合聲光媒體技術來做身歷其境的呈現。

---

<sup>24</sup> 國防部決定要把禮拜堂重建於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College Duntroon)，同時有澳洲國家文化資產局提供協助。

<sup>25</sup> 同上註解。

由於安全考量和有限預算，最終方案是建造一個博物館，以合院建築形式圍繞著異地重置的小教堂。新加坡旅遊局發出公開邀請，希望能收集到前戰俘的紀念物、書信，各種物品或敘事以展現他們在樟宜的記憶。這同時也是新加坡旅遊推廣局希望邀請前戰俘參與、認同支持紀念館計劃的方法。這次要選擇重現的教堂是聖喬治禮拜堂，原為 1944-45 年由受刑人所建築於監獄之中(Beaumont, 2009)。計劃籌備期間，也正是坎培拉戰俘紀念館計劃進行的時間，新加坡推廣旅遊局爭取了澳洲方面的支持，也透過退伍軍人聯盟邀請到前戰俘參與討論禮拜堂建築外觀呈現的諸多細節。在這共時的跨國交換中，權力、知識跨界流動孕育了一個暨新且舊的「樟宜小教堂」(圖 10)。



圖 10 樟宜博物館小禮拜堂  
(資料來源：作者攝於 2014 年 1 月)

樟宜紀念館比預期的還要成功，開館一年內計有 10 萬 8 千名訪客。然而，根據留言本可知大部份訪客誤以為樟宜紀念館就是戰俘營原址。多數人無法分辨樟宜戰俘營、樟宜監獄，也不清楚戰俘被迫勞動的工事現場其實多位於泰國和緬甸。紀念館中的展品選擇可能也間接深化了誤解，館藏許多東南亞戰俘記憶其實並非在樟宜發生。

### 三、罪行的再現

2001 年二月，由於樟宜監獄擴張之需，禮拜堂再次搬遷，距離先前位置約 1 公里處。今日館內仍有許多關於死亡鐵路文件。例如，著名漫畫家雷諾·席爾(Ronald Searle)即為樟宜監獄戰俘，曾在死亡鐵路上服役的他捐出不少作品給樟宜博物館。此外，一幅名為〈兩位瘡疾患者和一位霍亂病人〉由雷·帕克金(Ray Parkin)創作，描繪其所觀察的鐵路沿線勞役慘境。重建後的樟宜監獄禮拜堂依舊是觀光焦點，戰俘和戰俘家人來到這裡試圖闔上「戰爭年代造成的情緒傷口」(引述自樟宜博物館展覽內文)。

過去十年，樟宜博物館終於開始增補有關於女性戰俘的展覽。不少學者指出，戰俘歷史往往忽略了女性和小孩的經驗(Archer, 2008; Blackburn, 2000)。瑪麗·安琪拉·貝特曼(Mary Angela Batmen)是一位美術老師，她曾以大量繪畫記錄其樟宜戰俘經驗，然而，直到 2002 年因某位收藏家在英國的二手商店發現其手稿才得到注意(Meo, 2006)。到了 2005 年，貝特曼的作品終於收錄於「樟宜博物館」的「戰爭藝術部門」。然而，數以千計女性戰俘是消音隱身的，他們未曾於展示再現中與男性戰俘一般重視。博爾尼斯·艾曲(Bernice Archer)是相關研究中少數指出女性戰俘身影的作品。例如，他訪問到一名戰俘瑪莉·湯恩斯(Mary Thomas)，她憶及被捕後需要步行七哩路抵達樟宜的辛苦路途：「終於，那灰牆和監獄屋頂出現在我們的視線中，我們已熱壞了、累昏了...我們走向樟宜時努力唱著『總是會抵達英格蘭的領土...』」(2008: 229)。然而這種敘事在樟宜博物館中強調男子氣概的戰俘形象仍屬少數。

除了新加坡和澳洲，東南亞還有不少國家近來投入戰爭紀念空間的營造。在東南亞區域有數間博物館興建，例如泰緬鐵路沿線的「北碧戰爭博物館」(the Jeath Museum, 1977)、黑爾伏耳關口博物館(the Hellfire Pass Museum, 1998)。雖不少研究已指出這類博物館展示對於戰俘生活的描繪過於誇張地強調其「恐怖、殘酷」，它們仍然樂此不疲，包括樟宜博物館都在持續深化這失之偏頗的意象。其中，興築死亡鐵路的慘境是最常引用的一段。2014年，在臺灣譯為「心靈勇者」，但原意為「鐵道勞工」(The Railway Man)的電影上映，由知名影星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與科林·弗爾斯(Colin Firth)演出。這部電影該編自艾瑞克·羅馬斯的同名回憶錄(Eric Lomax, 1995)。羅馬斯是前英國戰俘，曾被迫加入死亡鐵路的勞動。他的回憶錄中揭露了戰爭造成的心靈傷害，以及他如何與當時施暴的日本軍人再次相遇，尋求相互的理解與原諒。電影上映後，羅馬斯的妻子曾受邀至坎培拉拜訪「樟宜禮拜堂」(November 18, 2013)。有趣的是，她的到訪被澳洲國防部視為重要事件，特意彰顯於官網(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

這兩個距離千里的「樟宜博物館」如此不同又相連，都有澳洲戰俘的參與，以及透過樟宜禮拜堂的移動，聯結起新加坡與澳洲兩地，在旅程中，戰俘的樟宜記憶「去地域化」且復「再地域化」。就像是旅順日俄監獄案例，記憶與記憶之再現並不會隨著博物館完成而停止。展覽內容的策劃更替，甚至國際旅客的參與，或可說是為吸引國際旅客的用心，都不斷挑戰原有記憶，以及記憶之展示。布雷克伯恩(Blackburn, 2000)曾提問：「這些博物館確實追思了個體殊異的經驗嗎？還是再製了刻板印象，以供公眾消費過去？」類似的批評質疑可能永不會消失。隨年歲過去，那些與「樟宜」沒有直接關係的旅客泰半會取代前戰俘的回訪。而時間將會如何與「樟宜」這充滿記憶的地方移動對話？樟宜，從來就不只是屬於一棟建築或一個國家。

## 比較：監禁空間還是記憶空間？

義士和英雄因為壓迫者與惡人而存在。壓迫者所築起的殿堂與監獄，並沒有被掩飾或忽略，反而成為（遺產）保存重心，對訪客推崇、演繹，作為打造新國民、傳遞新國族建構的工具。(Ashworth et al, 2007: 112)

以上三個案例都和佔領、戰爭的記憶有關，然其地方記憶卻不限於三個國家，澳洲、日本都是不在場的國族論述參與者。在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中強調「義士」形象可視覺化日本侵略中國、韓國的「罪行」。在樟宜監獄中呈現的戰爭記憶則描繪戰俘為勇敢不屈的鬥士，他們的死亡或倖存見證了日本帝國佔領的非人性。在臺北，有關戰爭的記憶則微乎其微，正如被保存的監獄遺址也僅為整體一小部分。綜觀三個案例，其共通處是文化資產都架構於清楚不容質疑的單一國族歷史記憶。如果歷史複雜不能符合當前國族敘事主流，則不易受到重視，例如「臺北刑務所」，於是，只是作為有待更新的「華光社區」被認知，成為不同機關暗自角力逐利的場域。為了維持當前政權歷史敘事的完整性與合理性，文化遺產的歧異、爭議並不受重視。當然，改變的機會仍存在，如今日新加坡政府更有興趣推廣多元文化主義和全球化，或能因此鬆動而容許多樣敘事。同時，新加坡與澳洲的樟宜禮拜堂展現了地方記憶的去地域化與再地域化，而國家之間可合作再現空間記憶，不一定是競爭關係。

帝國日本本位的記憶顯然在今日東北亞是邊緣化甚至污名化。當日本在1945年投降時，二十世紀初精心打造的「人性國族主義」形象已為戰爭「罪行」所取代，而日本離開前殖民地以後，也失去了所有相關現代化計畫重要基地的地理聯繫。至此，戲劇似乎是唯一出路，透過歷史戲劇的拍攝，日本才能重拾前殖民地的歷史話語權。近來一例是NHK於2009年推出的《坂上的雲》，以司馬遼太郎同名小說改編，描寫日俄戰爭前夕，日本如何形塑其國民，勇敢為國家出航前進，而透過日俄戰爭，日本如何艱辛地避免自己成為西方強權的殖民地，不能重蹈中國困境，某程度合理化其征戰。這部戲劇

讓許多日本遊客對於東北的戰爭歷史地點充滿興趣，例如關鍵一役的旅順203高地<sup>26</sup>，以及其他滿洲國地景，包括大連、旅順。藉由這戲劇所渲染出的帝國過往，很顯然地與旅順日俄監獄博物館所呈現完全不同。

研究文化旅遊、遺產旅遊者已指出文化資產事業幾乎不可能避免商業化歷史的危機(Lowenthal, 1998; Urry, 1990)，即使是有關負面歷史的文化資產<sup>27</sup>。如同琳恩·梅可爾(Lynn Meskell)指出「負面資產」(Negative heritage)充滿矛盾歷史，宛如集體記憶計劃可取用的負面記憶儲藏庫(2002: 558)，而這取用過程必然是選擇性的，甚至可用於正面目的，例如廣島原爆遺址或奧許維茲集中營，他們就像是「記憶場所」(lieux de memoire, Nora 1989)，使有關過去的敘事更多元(Rico, 2008)，卻也可能成為說教工具，例如旅順和樟宜的案例。在創造文化遺產的當下，我們想像「過去」和「未來」。因此，我們應當時常記得艾許沃爾茲(Ashworth, 2009)的提問「是誰在創造、傳遞文化資產，而且是為了什麼當下的目標？」換句話問，為了什麼當前目標，我們打算不要保存文化資產？

博物館與監獄類似的構成關係或可幫助我們思考有關現代化的歷史。在《博物館之誕生》(Bennett, 1995)的作者湯尼·白奈特並不同意道格拉斯·克林普(Crimp, 1993)把博物館中的藝術品比擬為監獄中的受刑人。白奈特認為公共博物館已試圖打破藩籬，對公眾開放，迥異於過去貴族私人收藏古物名品於私宅，僅限上流社會賞玩的作法。白奈特的分析更細緻，指出博物館的發展在形式上和現代化監獄看似相反，不過兩者都是現代化國家規訓的工具，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教化民眾，讓人們成為國家治理規範的客體(Bennett, 1995: 98)。

由公共博物館所鼓勵的國家－公民關係，如白奈特建議，視人們為主動積極的公民而非被動的群眾。然而，當訪客走進了除役監獄所改造的博物

<sup>26</sup> 在1980年出品的電影《203高地》即為一追念日俄戰爭榮光的電影。

<sup>27</sup> 有些學者以「爭議文化遺產」(dissonant heritage)來強調文化遺產的詮釋必然充滿爭議(Tunbridge & Ashworth, 1996; Landzelius, 2003)。



館，監獄和博物館所象徵的兩組現代關係不得不模糊交疊了。究竟在博物館中展示的是什麼？管制監禁的是什麼樣的監禁記憶(memories of incarceration)？選擇性的監獄建設歷史、刑罰之改革、受刑人的記憶，還是建造監獄並施加壓迫的敵人？某程度而言，展室就像囚室，鼓勵且監禁著人的感受記憶，形塑了一種特殊的展／禁關係。當賓州式監獄系統成功喚起了監禁的隔離感，作為懲罰技術，本文所討論的監獄改建博物館則監禁恐懼、害怕、以及予以殖民者／建造監獄者持續的譴責。殖民監獄改建的博物館成為記憶競逐的場域，也是記憶被監禁的空間。即使今日有關展覽再現的決策與技術都已逐漸民主化、公共化，國家扮演角色仍有一定影響力，試圖挑戰國族界限的記憶敘事者仍有限。

在 2012 年《臺北雙年展》中有「微型博物館計劃」，藝術家波特萊爾(Eric Baudelaire)以「前」紀念館(Ante-memorial)提案質疑了紀念館／碑的不斷興建，其實並沒有讓戰爭或災難停下來，他以未曾發生的核武攻擊以及虛構的核戰紀念計畫，來質問未曾發生的和平。如同蘇盈如評論該作品時問道(2012)「...在屬於公眾的博物館空間裡面，人還有沒有辦法思考：如何終止紀念？」這「終止紀念」當然不是要反對紀念，但她尖銳地提醒了我們，為什麼要紀念？紀念並非為了報復或再次受控於驅策戰爭的國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共謀，而是為了要走出國家暴力的框架，思考除了成為烈士或崇拜烈士，是否有其他歷史認識可能？

少有研究討論監獄博物館展覽所體現的類宗教力量。當初樟宜監獄中的禮拜堂、小教堂、天主堂都是戰爭期間支撐戰俘度過的重要宗教空間，也在戰後繼續成為支撐受刑人心靈的重要場域，因此也才逐漸演變為眾人認同的「紀念空間」。在旅順，中國利用日俄監獄博物館來作為日本侵華罪證，以及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成功抵抗帝國主義。有關愛國義士的展覽也展示着某種造神過程，乃至於北韓和南韓訪客竟可並肩在安重根雕像前禱告祈求國家分裂告終。監獄空間中的崇拜展現確實是深具規訓力的文化政治，未來還望有更多研究探討。

## 結論與未來研究

罪行（與矯正懲罰罪行）的論述—不正確之罪、頑民之罪、（東方民族）野蠻之罪—主導了本文所研究的殖民監獄興建計畫，從建設的開始、政權轉移與接收、除役、再利用為博物館，每個階段都有其陰影。已經轉型再生的殖民監獄是重要的參考點，讓我們可用不同的視角來審視臺北案例，去理解為何監獄完全拆除，以及曾在監獄旁生活的人們如何被驅逐，去思考「非法性建構過程」在殖民歷史脈絡中的當前意義。有關戰爭流離的歷史，「罪行」論述似乎仍主導着我們的認知，而無法去記憶省思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是如何透過現代化監獄所展示的罪與規訓來控制、改造這個城市。

此研究中，我試圖梳理監獄如何能成為理解現代國族主義運作的場域，以及監獄之記憶建構如何可能加深「殖民失憶」的病徵。監獄就好像一個展示着殖民現代性的博物館，同時也是展演罪行的博物館，而嚴懲敵人的意識戰爭未曾結束。究竟，我們有沒有可能從國族主義的框架中解放記憶（以及有關監禁的記憶）？透過東亞、東南亞三個案例的再現敘事比較，本研究認為監獄博物館的打造、經營和展示，傾向深化了「監禁」，只是今日展／禁歷史記憶的技術更細緻，比起監禁受刑人更無形，而改造監獄作為文化資產的潮流，也顯示了國家如何應用殖民遺絮來強化國族論述。未來的研究，我將進一步探討參與其中的不同角色，包括學術機構、博物館、公民社會，如何參與或抵抗新的「展／禁」記憶。此外，我也計劃擴充案例比較，包括由日本建立的韓國首爾西大門監獄保存（復建、申遺計劃研議中）以及英人建立的上海提籃橋監獄（保存計劃擬定中），或能為臺北監獄的保存展示計畫提供更多當代參照。

## 參考文獻

- 行政院時政講義，2013年7月16日。活化公有地，孵化「金雞母」，行政院電子e點通，取自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16.aspx?n=E9B83B707737B701&s=2C9BE9E93749CECB](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16.aspx?n=E9B83B707737B701&s=2C9BE9E93749CECB)（瀏覽日期：2014年10月10日）。
- 史宓，2000。違建社區與財富積累 以臺北市寶藏巖社區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
- 呂雪慧、林淑慧（2012年10月9日）。華光特區年底啟動 採 BOT 招商，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E8%8F%AF%E5%85%89%E7%89%B9%E5%8D%80%E5%B9%B4%E5%BA%95%E5%95%9F%E5%8B%95-%E6%8E%A1bot%E6%8B%9B%E5%95%86-213000162.html>（瀏覽日期：2014年10月11日）。
- 唐功春主編，2002。難忘却的一頁--旅順日俄監獄【上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秦富珍，2007年10月11日。華光社區變「華爾街」，蘋果日報。
- 夏鑄九，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47-82。
- 陳信宏譯，Saunders, D. 著，2011。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臺北：麥田。
- 陳信安，1997。臺灣日治時期武德殿建築之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南。
- 程維榮，2012。旅大租借地史。上海：上海社科院。
- 馮啓斌，2012。從道場到戰場：試論武道的轉化機制—以殖民地臺灣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新竹。
- 黃士娟，2012。建築技術官僚與殖民地經營 1895-1922。臺北：遠流；臺北藝術大學出版。
- 黃蘭翔，1995。日據初期臺北市的市區改正。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8：189-213。
- 楊文琪、何蕙安、林淑媛（2007，11月10日）華光社區更新 變身臺北華爾街，經濟日報。
- 廖珮妤（2014，3月14日）。金華街老屋文創 打造獄政館。聯合報，B1版。

- 蔡宛容, 2002。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1895-1945), 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師範大學: 臺北。
- 蔡敏真, 2012。居住城市的權利: 臺北市華光社區的都市民族誌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
- 蘇盈如, 2012。臺北雙年展之內與外: 偽博物館中的歷史和紀念。臺北: 破週報。
- Archer, B., 2008. Internee voices: Women and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being Japanese captives. *In: Hack, K. & Blackburn, K. (Eds.), 2008.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pp. 221-242. London: Routledge, 221-42.
- Ashworth, G. J., 2009. Paradigms and paradoxes in heritage as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IAPS-CSBE & HOUSING Network 2009, Requalifying Old Places for New Uses, Istanbul: Turkey
- Ashworth, G. J., Graham, B. J. & Tunbridge, J. E., 2007. *Pluralising Pasts: Heritage, Identity and Place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London: Pluto Press.
- Bennett, T.,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Blackburn, K., 2000. Commemorating and commodifying the prisoner of war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creation of Changi Prison Museum.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33, Retrieved October 11, 2014, from <https://www.awm.gov.au/journal/j33/blackburn/>
- Botsman, D., 2005. *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aumont, J., 2009. Contested Trans-national Heritage: The Demolition of Changi Priso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5(4): 298-316.
- Chua, B-H., 2011. Singapore as Model: Planning Innovations, Knowledge Experts. *In: Roy, A. & Ong, A., (Eds.), 2011.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and the Art of Being Global*.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Clavell, J., 1962. *King Rat*. Boston: Little, Brown.
- Corbett, P. S., 2008. In the Eye of a Hurricane: Americans in Japanese Custody during World War II. *In: Hack, K. & Blackburn, K. (Eds.),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pp. 111-24. London: Routledge,
- Crimp, D., 1993. *On the Museum's Rui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Nov 21, 2013. Changi Chapel receives special visitor. Retrieved October 6, 2014, from <http://www.defence.gov.au/defencenews/stories/2013/nov/1121.htm>
- Duguid, S., 2000. *Can Prisons Work? The Prisoner as Object and Subject in Modern Correc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Eagleton, T., 1999. *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Emerson, G. C., 2008.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Gilmore, R. W., 2002. Fatal couplings of power and difference: notes on racism and geography.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4: 15–24.
- Gilmore, R. W., 2007. *Golden Gulag: Prisons, Surplus, Crisis, and Opposition in Globalizing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 1962.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Chicago: Aldine Pub.
- Gregory, D., 2004. *The colonial present: Afghanistan, Palestine, and Iraq*.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 Hack, K. & Blackburn, K. (Eds.), 2008.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London: Routledge.
- Havers, R. P. W., 2003. *Reassessing the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Experience: the Changhi Prisoner of War camp in Singapore, 1942-45*. London: Routledge.
- Hofilena, J. (2013, November 20). South Korea criticizes Japan for calling independence activist a ‘criminal’ assassin. *Japanese Daily*. Retrieved from <http://japandailynews.com/>
- Ho Yi (2013, July 31). Preserving the past. *Taipei Times*, p. 12, Retrieved August 6, 2013, fro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eat/archives/2013/07/31/2003568565>
- Kowner, R., 2001. Becoming an Honorary Civilized Nation: Remaking Japan’s Military Image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05. *The Historian*, 64: 19-38.

- Landzelius, M., 2003. Commemorative Dis(re)membering: Erasing Heritage, Spatializing Disinherita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21(2), 195-222.
- Lennon, J. & Foley, M., 2000. *Dark Tourism*. London: Continuum.
- Lomax, E., 1995. *The Railway Man: a Pow's Searing Account of War, Brutality and Forgiveness*. London: Cape.
- Lowenthal, D. 1998.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o, N (2006, August 23). Singapore war internee's art on show. BB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5274472.stm>
- Meskell, L., 2002. Negative heritage and past mastering in Archaeolog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5(3): 557-74.
- Morris, N., 2002. *Maconochie's Gentlemen: The story of Norfolk Island & the Roots of Modern Prison Refor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T. & Morris, P. 1963. *Pentonville: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n English prison*. London: Routledge.
- Muzaini, H. & Yeoh, B., 2005. Contesting 'Local' Commemorati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ase of the Changi Chapel and Museum in Singapore. *Australian Geographer*, 36(1): 1-17.
- Murphy, H. L., 2006. *A History of the Prison in Taiwan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1895-1908)*.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 Nora, P.,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 Rauhala, E. (2013, November 25). Korean-Hero Statue in China Upsets Japan. TIME, Retrieved June 15, 2014, from <http://world.time.com/2013/11/25/why-a-korean-chinese-statue-is-upsetting-japan>
- Rico, T., 2008. Negative heritage: The place of conflict i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10(4): 344-352.
- Sellin, T., 1926. Prison reform in Belgium.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7(2): 264-277.
- Shimazu, N., 2009. *Japanese Society at War: Death, Memor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zuki, S., 2011.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Takayama, Y., 2012. *Red Tourism in China, India, Russia,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on Eurasian Culture and Society*. Sapporo,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 Teeters, N. K. & Shearer, J. D., 1957. *The Prison at Philadelphia: The Separate System of Penal Discipline, 1829-1913*,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Torres, T. (2013, November 19). China 'respects' Korean hero who assassinated Japanese official in 1909. *Japanese Daily*,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3, from <http://japandailynews.com/>
- Tunbridge, J. E. & Ashworth, G. J. , 1996.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Sussex: John Wiley.
- Umemori, N., 2002. *Modernization through Colonial Medi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ice and Prison System in Meiji Jap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 Wakabayashi, I., 2008. Ahn Jung-geun and the cultural Public Sphere. *Research notes*, 19 (1): 157-163. 文教大学国際学部紀要, Bunkyo University.
- Wilson, J., 2008. *Prison: Cultural Memory and Dark Tourism*. New York: Peter Lang.

